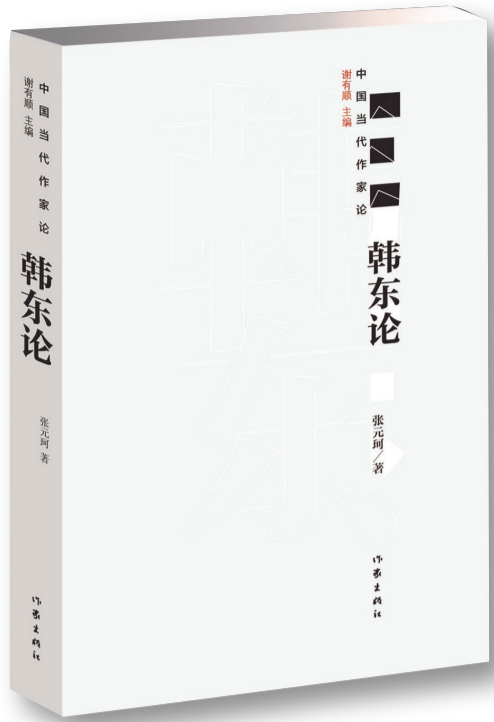


多文体批评实践的立体展开与精神历险

评张元珂的《韩东论》

□张立群



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积累的经验,选择在各体创作上均取得成就的作家进行整体性研究往往会有几分“冒险”:无论是广义的文学史研究,还是所谓的个案批评,当代文学研究分工日趋精细,小说、诗歌等各体文学研究日益形成独立的单元并拥有自己的批评理论和研究范式,已使许多批评者很难在一部著作中一展自己才能的多面性。但从创作的角度上看,多面手的作家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他们在诗歌、小说、散文乃至影视方面上取得的成就也理当受到关注,进而在深化其创作的整体认知的同时,为日后的文学史书写留下一个丰富的个案。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韩东作为评论对象、进行“作家论”研究,可视为张元珂接受挑战之后的一次学术历险。

依据自己对于当下学术范型的理解,张元珂在《韩东论》中确立了递进式和并列式论证有机结合的方式,“即在大处写小和小处写大之间尽力保持一个合理的度,既不能因大而显得很空和不及物,也不能因小而显得很琐碎,乃至一叶障目、坐井观天。”(《韩东论》,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前言”第6—7页)《韩东论》在整体思维和结构框架上始终将论说置于历史的纬度之上,而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结论的推演则落实到小处,从具体的作品入手直至具体的句子、细致入微。这可以当作张元珂《韩东论》的立说观念,决定其成书过程中的行文线索和内在理路。

没有从传统的知人论世模式即生平经历介入,而是从“文学活动论”开启自己的言说之旅,可见张元珂本人也是非常重视“观念”的。鉴于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已成为一句名言、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张元珂首先对此进行分析。在简单介绍这句名言生成的过程之后,著者依次分析了其多重含义、反思立场以及宣言与实践中的差异,进而“补叙”了韩东对此宣言的补充和修正,如从“中国诗歌到汉语为止”到“中国当代诗歌到现实汉语为止”,韩东对理论持续的探索,一方面源于理论本身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表明他对理论本身的清醒与自知,至于由此得出韩东的反思与修正则是建立于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的前提之下,并寄托了一位作家“一种乌托邦式的宏大理想”(《韩东论》,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则反映了张元珂对于韩东诗学观念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他由韩东的观点拓展至“现实汉语”的现状与未来并将视角和对象放大至百年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历程中加以考察,也足以表明他在论述韩东时绝非是简单的事就论事、流于表面,而是将其置于文学史视野之内的研究特点。

除“诗到语言为止”之外,张元珂还相继剖析了韩东的“民间”;韩东与多位诗人、研究者之间的论争,并在“结社与编刊”的论题中呈现了韩东与《今天》《他们》以及“与他们”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延伸至世纪之交著名的“断裂”事件。通过这些可以呈现观念意义的历史与行为的“再现”,张元珂写出了文学道路层面上的韩东成长史。毫无疑问,韩东是一位有思想、见地的理论家和作家,他的思考、主张以及相应的文学活动总是与当代文化思潮互为关联。尽管,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韩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会有一定程度的“缝隙”甚至是“断层”,但从文学中来、到文学为止,既坚持自己的主张,又能在和语境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调整、修正某些部分,这应当是韩东30余年来始终处于当代文学前沿位置的重要秘诀,同时也显然是张元珂想通过《韩东论》所要揭示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张元珂将“文学活动论”作为《韩东论》的第一部分、力图呈现韩东的文学观念,依次论述韩东的诗歌、小说以及散文与电影论,俨然已成为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当然,这种逻辑就全书来看,也设定了《韩东论》的结构。成书后的《韩东论》主体结构分四部分,四部分以“编”命名,加上开头的前言,结尾的“韩东文学年表简编”和“后记”,形成了典型的总分总结构。阅读这些部分,可以明显感受张元珂对自己著述有着丰富性和多样化的审美追求,如果说“前言”是以介绍的方式概括了韩东多元创作的实绩及文学史地位,进而和后面的结构一一对应,那么,在“文学活动论”、“诗歌论”、“小说论”和“散文与电影论”中,他一直试图将韩东的创作进行立体化的解读。除上文提到的“文学活动论”之外,他以年代史的方式历时性论析韩东的诗歌,并在分述韩东“80年代诗歌”、“90年代诗歌”和“新世纪以来诗歌”的过程中,史论结合,从接受、语感、形式、叙事性、代表作以及口语、意象等不同角度分析韩东的创作,从而高度评价韩东对于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贡献;以范晴论的形式即“创作论”、“本体论”和“艺术论”相结合的方式共时性地阐释韩东作为当代优秀小说家之一,在短篇、中篇和长篇,知青小说和情爱小说以及“虚构小说”、“智性品格”等不同层面取得的成就……都表明张元珂在试图表现韩东创作深度、广度之余,还想要以非单一、不重复的叙述展现其创作的维度。正是由于张元珂对于《韩东论》的每一编、每一章、每一节都采用了不同方式的论述,才会使《韩东论》具有多维度、多线条的立体结构,并使读者在阅读全书之后可以生动而真实地触及到韩东创作的多义性本质,进而看到“总之,韩东出入于各种艺术领域,以自创的文艺理论为指导,以诗为经,以小说为纬,以散文为视界,以电影和剧本写作为补充,建构起了一个立体的、丰富而驳杂的、万花筒般的艺术世界”。(《韩东论》,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前言”第5页)

《韩东论》材料丰富、立论翔实、论说全面,充分体现了著者的学术素养、论说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为了完成对这样一位“球型天才”人物的多方位解读与深入阐释,张元珂显然动用了“所有的知识储备和内在力量”。他将“韩东论”视为一个“复杂而深邃的论题”,坦言自己“既无诗学修为,也无创作经验”(《韩东论》,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后记”第395页),皆可作为其重视此项工作、用心为之的明证。正因为如此,他对“诗到语言为止”的分析,对韩东结社与编刊过程的梳理;对《你见过大海》的语感分析、对《甲乙》是90年代诗歌代表作的判断;以及对韩东“虚构小说”、散文修辞角度的把握,才能切中肯綮、既富有独特性,又有创见性。《韩东论》不仅展现了一贯以文献史料见长之张元珂的学术功底,而且也凸显了“转向”批评之张元珂良好而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相对于“作家论”客观需要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张元珂通过其实践,证明了如何将这一能力集于一身的过程。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并体验张元珂在回顾《韩东论》完成时的一段话:“我论韩东,首在发起对话,力在寻找意义,志在叩问真理,但归根结底在为生活本身寻找赖以停靠的港湾。”(《韩东论》,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后记”第395页)应当说,想要完成韩东、张元珂两个“实在界”之间的对话,进而在超越“实在界”的阶段之后进入“精神界”,是需要用心去感受自己所要呈现的对象的。通过张元珂在《韩东论》中呈现的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如何以灵魂观照的方式讲述韩东并以此完成自己的体悟。也许,由此将《韩东论》的实践称之为再现当年李健吾“灵魂与杰作的奇遇”有些言过其实,但从张元珂主观上想要达到的效果和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及匠心独运的情况来看,他显然借助《韩东论》实现了一次精神历险并由此在研究上登临一个新的起点!

作为内蒙古“中生代”代表作家,海勒根那最新出版的《骑马周游世界》除了整部书的装帧设计和奇幻的插图让人惊艳外,其特立独行的小说文本更令人称道。24个短篇融合着令人目眩的现代小说技法:魔幻、隐喻、寓言、象征、荒诞,甚至于惊悚,但其内在却紧握着现实的泥土,深植于内蒙古东部的辽阔边地。

这更是一部书写人类与大地困境之书,呈现出受难与拯救的悲剧精神,以及现代性、民族性、诗性和神性,融入了作家深切的生命体验,并以幻想与真实的文字展示出独特新质。一个地标式的民族作家,他的作品离不开长生天及万物有灵的朴素信仰,离不开与之相生相伴的土地。那些孤独的蒙古马、神秘的羊群,辽阔的草原、浩瀚的森林、荒凉的沙地、干涸的河床,以及生活中其踽踽求索的人们,都成为这些小说的生命意象。他以痛切的心灵体验为基,沟通时空,在真实与超验中表达人类的困境与希望,并力图为大地上申诉。

苦难性:在魔幻与真实中表达心灵体验

在评述这本小说集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到海勒根那的身世,正如海明威所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不是别的,而是拥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海勒根那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南部蒙汉杂居的乡村,那是一片早于他出生前就因农耕而沙化的土地,他4岁丧父9岁丧母,“自小游走于科尔沁方圆百里,吃‘百家饭’长大”(作家创作谈《关于活着和吃饭》)。作为游牧人的后裔,他的命运亦充满了宿命感,在极度贫瘠和艰难中长大的他,竟一步一步从失去母语的农耕乡村回溯到蒙古人的祖地——呼伦贝尔,蛰居于真正草原和森林之间。那是一段苦难而多舛的人生历程,自他18岁中学毕业开始“骑马周游世界”,做过各种苦力及最底层工种,而且经常失业,朝不保夕。海勒根那谈到,无论如何活下去,是他当时的唯一信念。我们想,那些露宿街头的夜晚他是否梦到了狮子?

当这些生命体验浸入海勒根那的作品中时,我们总会看到他关于受难与拯救的身影。就像余华谈到早期作品中的战栗与不安来源于童年在停尸房睡午觉的经历,而海勒根那小说中的紧张和不安,更带有蒙古草原的意味,如《伯父特木热的墓地》中的鲑鱼食尸,《绿眼人家族》中的雨夜狼群,《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中世纪的灵魂》,那种恐怖的气氛是爱伦·坡式的。小说中的人物与作家一样存在着流浪和漂泊感:如受尽生活挫折的哥哥巴根那变为头羊神秘出走,孤独的牧羊人以勒与乌鸦一起远走高飞,只身一人行走于西域大地的骑手嘎达斯,失魂落魄的白狼马短暂休憩后又将去往远方。就像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常常潜伏着生命危机一样,作家在《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中直述,“那当儿我才知晓,人的欢乐失不复得,自己只是一粒尘埃,在人间间浮游或寂落”。

“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具有深刻的苦难感。”(张炜《心中的文学》)作家以生命体验作为小说创作原动力,与纯粹虚构的小说有着本质区别。除了《科尔沁兄弟》《脚印》等纯粹讲述故乡故事之外,作家往往通过对童年创伤进行自我疗救,进而追问生命和民族的意义,发起拯救土地的愿望。那些陷于困境的卑微弱小,大多附着作家当年的影子和他的所见所感,如寻找青鸟的傻孩子、自闭弱小的羊圈里的弟弟、屡受挫败的巴根那、失恋酗酒的特木热、寄人篱下的以勒、妻离子散的骑手嘎达斯、嗜酒的别佳、误伤人命的猎人……即将遭受屠刀或受缚于泥滩的蒙古马,真正的作家是将自我生命与大地生命合为一体的,面对干涸的河流、龟裂的田地、沙化的草原、被毁掉的森林,势必要为大地面临的困境代言和申诉。

现实难以跨越,只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穿越时

《古韵新声诗三百》序:

千年诗史谱新篇

□袁鹰

中国有连绵千载的诗歌历史,是举世无双的诗的国度。在上古年代,就出现内容丰富多彩的诗歌总汇《诗》(后被尊称为《诗经》)。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就叮嘱他的弟子们认真学《诗》,他曾精辟地阐明《诗》的功能:“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就是说,强调诗具有鼓舞、欣赏、团结和批评功能。那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最古老的情景交融的诗。悠悠千载,“兴、观、群、怨”四个字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之后,历经汉魏六朝诗人们的创作,到唐代,由于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王维、李商隐的卓越贡献,诗歌进入了光辉灿烂的时代。及至后世的优秀选本《唐诗三百首》,连绵千载,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学诗的范本。即使后来宋词、元曲直到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白话诗成为主流,也从未影响日体诗的流传。到现代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和作者,也不断出现脍炙人口的优秀之作,继续发挥“兴、观、群、怨”的独特功能。我想,在未来的年月,也必然会延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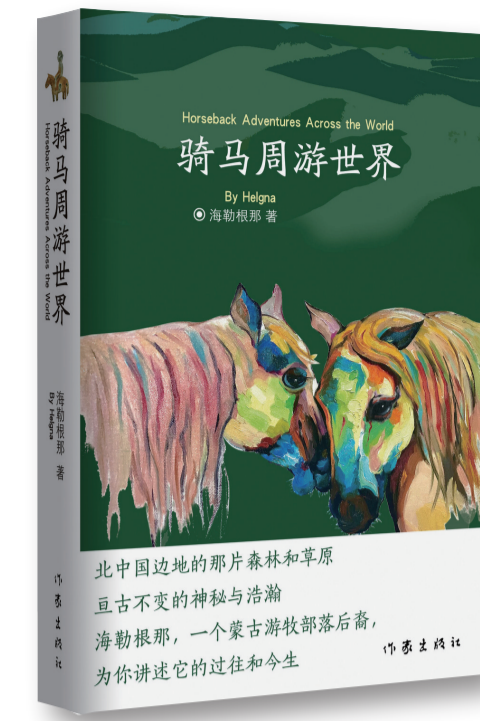
记得在我童年时代,曾经中过前清进士、当过几任地方官的祖父,就教我读唐诗。最早的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及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两首比较浅显易懂的诗。他规定我无论懂得深不深,一定要背诵。他说:“多读就能记住。”我到现在已95岁,老、弱、病、残俱备,但还能背诵不少唐诗名篇,包括《琵琶行》《长恨歌》这样的长诗,是当年练就的“童子功”。我不知道现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多少流传的名诗,老师是否要求学生能背诵;我以为是,能够记住并且流利地背诵,应该是读诗的基本功,也才能逐渐领会到诗的功能。

几位热爱旧体诗的友人不辞辛劳,广泛搜罗,编纂了这本《古韵新声诗三百》,是一件意义深远、功德无量的好事,让具有悠久历史的诗歌传统继续传承下去,也能满足我们这样的中老年读者的愿望。因而说了这一堆啰嗦话,表达感谢和期望的心情。也请读者朋友指正。

(摘自《古韵新声诗三百》,袁鹰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在困境与荒原中突围

——评海勒根那短篇小说集《骑马周游世界》 □姚广



间和空间才能达成这种理想,所以只能以幻觉、梦境、预言、想象等超验形式来实现精神表达的诉求。这也正反映了作家的精神世界,实际上,这位父母早逝的作家也正是在备受艰辛中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立足点的。马尔克斯在《影响和写作》中写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真实事物同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因为在我试图回忆的世界里,这种界线是不存在的。”海勒根那非异人异事不写,他笔下的人变鸟、人变羊、人变鸟和人的亡灵不灭等等都是在困境之下生成的,他以自身生命体验使其相融一处,进行艺术再造,呈现真实并实现文学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海勒根那对魔幻、荒诞的技术运用并非无由来或生搬硬套那些马尔克斯、卡夫卡等文学大师,而是不留痕迹,甚至让这些超现实的变异自然生发,潜移默化般让人不得不信以为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真实效果。

民族性:身份的确认与民族情结的多种表达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自我身份的确认尤为重要。海勒根那从小失去父母而导致母语和故乡的丧失,他内心中的“失去”情结每每暴露于笔端。《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中,亡灵帖木儿·蔑里是被鞑靼人祖先杀死的花剌子模人,他穿越时空来找寻他的后裔实际是对民族身份的一种探讨与确认。《骑手嘎达斯》中嘎达斯与萨满的对话都是在追溯和回顾,他在与老说书人的交流中受到启悟,最终挣脱现实困境而执着追寻成吉思汗之神骏。《寻找巴根那》更是直接表达了作家对民族的认同与回归,“而我的族人也曾属于蒙古族中最古老的姓乞彦的部族,当年追随圣主驰骋天下,我的族人变成了农耕的汉人,连母语都忘记了。”

另一个主题则是对蒙古英雄的敬慕、蒙古精神的追寻、民间传说的回顾。如多篇作品中反复插入和提及的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包括“白狼马”也是嘎达梅林的坐骑;《骑手嘎达斯》里的骑手曾一蹶不振,后来

是蒙古说书人的古书点燃了他去西域寻找圣祖两匹骏马的梦想;《温都根查干》充满了对成吉思汗神骏的想象;《小黄马》则是对蒙古长调歌王哈扎布故事的演义和重塑。再是对民族文化面临消失的忧虑和精神传承。正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说,残存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包括神秘的萨满文化对其观念的影响。比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因失恋而酗酒的特木热独居在河岸边,死后埋在那里而被大鱼享食,人的肉身就这样回归自然。嘎达斯历经艰险,在西域草原获得名声,终于见到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骏,虽死也终安详。作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决定了《白狼马》《骑手嘎达斯》《寻找巴根那》等小说都带有萨满文化的遗存。而这种民族血脉的涌动也使得海勒根那不断地追寻蒙古马般的精神与荣光,使他在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中穿梭纠缠,并在后期创作的森林狩猎民族题材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实现了对狭隘民族性的超越。

诗性:空灵叙事、长调的笔法与大地抒情

“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本身都是诗,小说当然也是。”(张炜《谈谈诗与真》)海勒根那的文字不乏空灵之笔和意境,如《白狼马》中的白狼马与《牵风记》中的滩枣一样,都有着传奇的色彩,都有一种空灵的境界叙事特征。作家借助充满诗意的笔,沟通和搬运真实与想象,打破现实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达到自由美好的境界。

这种诗性还表现为抒情性。细读《最后的嘎拉》《辽阔的巴尔虎草原》,可以感受到蒙古长调的特征,笔调之抒情,情节之跌宕,基调之悲怆,让我们甚至可以倾听到勒勒车在草原行进中的吱扭之音,百灵鸟在天空中的百转千回。《最后的嘎拉》里,父亲与母亲在盐湖相见的一幕,令人动容落泪——草原上的爱情是悲怆而震撼人心的,让人想起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同样,《辽阔的巴尔虎草原》也写草原母亲,但更多表现了蒙古母亲的坚忍博大,草原母性的诗意杂糅了人生的悲情,既写出深痛,更写出了大爱。

这种诗性还表现在人与大地关系之中。这些小说给人的自然空间感很强烈,有自然诗性的光芒,这与当下泛滥的缺少天地意象的同质化小说相比,显得风格迥异。张炜认为“景物描写不仅表达了作者,还表达了作品中的人物对自然的理解和情感,表达了整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写大自然,也是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一份人生之恋、对母亲大地的感激之情。”(《文学七聊》)这种诗意是更广泛的温情观照,不仅是人和物,还有大地母亲和世界。海勒根那小说无论是穿越奇幻还是荒诞真实,无论是草原母亲还是蒙古英雄,无论是森林还是河流,都富有大自然的诗性,即使是一匹马也是那般决绝——这是一片诗性与神性相依共生的土地。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写作着眼于人之生存的心灵困境,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拯救,相反,他不回避社会矛盾且专注于需要精神援助的人事和大地,并在困境与荒原中突围,体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担当与勇气。从作家第一部小说集《到哪儿去,黑马》到《父亲鱼游而去》乃至《骑马周游世界》,不难发现三部小说集一直存在隐性的哲学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你会发现它们形成了一个问答关系的闭合结构,这意味着一种精神成长,但同样又面临新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映射的正是人类和大地的真实镜像。

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库库淖尔的山鹰》静静地躺在案头,厚厚两大本。这部由著名作家、学者海风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历经八个寒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前夕由作家出版社付梓出版。

这部诗作长达14000余行、20余万字,长篇叙事诗一般都是歌咏诗人代代相传、口口传唱、历经无数歌咏者的心血凝聚而成的,如《荷马史诗》、如《格萨尔》等等,而《库库淖尔的山鹰》则为个人独立创作完成,仅此一项,这部作品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被出版社以“诗歌创作史上的奇迹”推送给全世界的读者也就不奇怪了。

《库库淖尔的山鹰》描述了中国西北历史上回鹘、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部落遭受西北军阀马步芳家族残酷欺压迫害的悲惨命运为切入点,展现了蒙古族青年兀鲁骨惕由自主地反抗民族压迫到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全诗共分26章,叙事宏大,风格壮阔,格律严谨,12字一行,8行一段,以蒙古长调的叙事方式反映了蒙古族人与天灾人祸不屈抗争的坚韧毅力和斗争精神。

库库淖尔是蒙古语,意即青海湖,之所以选取青海蒙古族为叙事诗的民族载体,恐与海风坎坷的经历有关。他曾下放青海,把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青藏高原,但这段磨难却也造就了一位草原民族史研究的大成者。海风对草原民族有着极深的研究,曾出版过多部草原民族的历史专著、民族传记等,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他主持过匈牙利民族史诗片《东方之根》的文学创作和拍摄工作,被匈牙利古代史出版协会聘为客座教授。

厚积而薄发,《库库淖尔的山鹰》酝酿、积累几十年,正式动笔创作时,老先生已值80高龄,两年的时间里,老先生的老手不释卷,寒暑不浸,反复撰写、吟咏、推敲、修改,渐渐地让诗行生动、丰厚起来,让历史鲜活起来,让人物栩栩如生,鲜活之令人敬佩。

这是海风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叙事诗,更是他大半生研究草原民族、挖掘草原民族历史、讴歌草原的心血结晶。

此书脱稿后,经出版社、各路专家的多方评审和推荐,再经国家多个权威部门长达数年的反复审核,如今终于成书,可谓经得起各方检验,更经得起历史检验。

草原歌咏者

读海风新作《库库淖尔的山鹰》

□大卫

